

定位與定性： 社會主義論戰中的“梁啟超系”^{*}

周月峰

[提 要] 在時人記憶及既有研究中,發生於 1920 年前後的社會主義論戰多以營壘分明的方式呈現,常將“梁啟超系”視為社會主義的反對者。然而,“反社會主義者”的定性本身便是有待辨析的歷史認知。在論戰中,“梁啟超系”常以社會主義者或社會主義的同情者自居,而將論戰視為社會主義不同派別間“關於 Bolshevism 的討論”。與此相對,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從俄國式勞農主義的立場出發進行有組織地反駁,以急進、全部、徹底的革命為社會主義標準。在此標準之下,因“梁啟超系”傾向漸進、改良的社會主義,“不主張革命”,也就被認為不是社會主義者,且是反社會主義者。這一在特定語境中具有政治鬥爭意味的即時認知,無形中塑造了歷史記憶並影響到早期的相關研究。

[關鍵詞] 社會主義論戰 “梁啟超系” 早期中國共產黨 布爾什維克主義 基爾特社會主義

[中圖分類號] D693; K2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1 - 0173 - 16

“梁啟超系”是 1920 年前後“社會主義論戰”^①的引發者與重要參與方。這是一個以梁啟超為核心的讀書人群體,曾活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之中,主要成員包括梁啟超、張東蓀、蔣百里、藍公武、張君勱等人。^②在歷史記憶中,該派常以社會主義反對者的面目出現。1949 年之後,當初曾參加論戰的中共黨內理論家李達就認定梁啟超一系“反對社會主義”,並聲稱“我們”在論戰中“駁倒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們的淺薄無知的言論”。^③

或受到黨內定性的影響,早期的研究者多將五四前後的“梁啟超系”視為被批判者,以馬克思主義的眼光與標準看待,多注意其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或“偽社會主義”的一面。《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的作者認為“梁啟超系”的機關刊物“大量地登載了社會主義的文章和譯文,造成了擁護社會主義或者至少是‘客觀’地介紹了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的假象”,但實際上不僅“歪曲了馬克思主義,歪曲了十月革命和蘇聯,宣揚了修正主義和其他的反馬克思主義思想”,並且在 1920 年 12 月後“公開向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宣戰,暴露了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彭明則進一步總結“研究系”一方

^{*} 本文係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荷蘭藏各國駐中國公使團檔案整理、翻譯與研究”(項目號:23JZD039)的階段性成果。

面“順乎潮流”地大談社會主義，一方面即在研究防遏布爾什維主義的辦法，是“用偽社會主義學說抵制真社會主義學說”。葛懋春同樣看到“研究系”雖在五四運動後“乘著中國人民嚮往社會主義的時機，掛起社會主義招牌來反對科學社會主義”，其實“一直是社會主義的敵人”。^④此一時期有關“梁啟超系”與社會主義論戰的研究，大陸學界的主要分歧在如何劃定“梁啟超系”的階級屬性，即他們是“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還是“資產階級思想多於地主階級思想”，而對於梁啟超一系反對社會主義的定性大致相同。^⑤不過，台灣學者張朋園在梳理了梁啟超晚年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認識後，已提出“在某種限度下，顯示他對於此一主義是同情的”。^⑥

從 1990 年代開始，大陸學界對“梁啟超系”人物陸續有了正面評價。胡繩提醒，不能簡單地說梁啟超、張東蓀在社會主義論戰中“被駁倒了”，他甚至認為“他們講的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同時，學界對“梁啟超系”是不是反社會主義者也有所反思。應學犁認為 1920 年代的梁啟超是漸進的社會主義者，是“被當時所摒棄、被歷史常記起的社會主義問題的研究者和鼓吹者”。有學者進而指出：“梁啟超雖然與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保持一段距離，有些不同的看法和主張，但很難據此就說梁是一個對抗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反動分子。”^⑦此後隨著研究重心與範式轉移，中外學界已較少關注歷史人物、事件的定性問題，“梁啟超系”是否反社會主義似乎也隨之被淡化。

然而，歷史上“反社會主義者”的定性之形成過程本身同樣是重要的學術問題。對“梁啟超系”是否反社會主義的判斷，有時是基於時人或研究者自身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呈現的未必是歷史上的“梁啟超系”與社會主義。因此，與其追問“梁啟超系”是否反社會主義，不如先在動態中考察何時、何人、為何及在何種意義上視他們為反社會主義者，以及他們又是在何種意義、何種層次上反社會主義（或同情社會主義）。換言之，本文是將“反社會主義者”的定性本身視為有待辨析的歷史認知，嘗試梳理這一定性的形成過程與肌理，以期加深我們對社會主義論戰及論戰雙方的理解。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無意為“梁啟超系”人物正名或翻案，而是考察他們在當時的自我定位、他人定性之間的錯位及雙方論述背後的思考邏輯；進而探討社會主義論戰與後五四時期思想潮流的互動關係，即在怎樣的思想潮流下，什麼樣的改造方案會被視為“反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論戰又是如何影響思想潮流的升降。

一、錯位的認知：社會主義者與反社會主義者

關於“梁啟超系”對社會主義的態度，時人其實就有疑惑。曾參與成立中國共產主義同志會的鄭摩漢觀察到，張東蓀、藍公武、蔣百里諸先生“對於社會主義，是非常喜歡發表主張或意見的”，但“不客氣說就是非常喜歡發表自相矛盾底主張或意見”。^⑧鄭摩漢那時與“梁啟超系”立場不同，言說間有批評該系“善變”之意。與此相似，論辯的參與者、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成員費覺天便指出他們“吞吞吐吐，忽而資本主義，忽而社會主義”。^⑨對於此種不一致現象，早期中共黨人和後來的研究者多將其置於“梁啟超系”（尤其是張東蓀）的態度急劇轉變中來理解。

茅盾在回憶中曾詳細描述這一轉向過程，他說：“研究系在政治上屬於右翼，但在五四運動後，也偽裝進步”，然而，“當梁啟超（研究系首腦）從海外歸來，態度即變。張東蓀在《時事新報》上發表社論《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即為自己重複右傾找‘理論根據’，以後就不談社會主義，且反對社會主義了”，有一“大轉彎”。^⑩“偽裝”與否暫且不論，在茅盾的記憶中，“梁啟超系”有一個從“談社會主義”到“反對社會主義”的“大轉彎”，而其原因則是梁啟超從海外歸來。

實際上，在五四前後社會主義思潮興起的過程中，“梁啟超系”不僅僅是參與“談社會主義”，而

且是最重要的推動力量之一。國民黨人馮自由在 1920 年初時仍認為，“梁啟超系”在鼓吹社會主義方面功不可沒，他們所辦的《時事新報》、《晨報》與《國民公報》“都極力發揮社會主義，中國人年來鼓吹這種主義報紙，以他們所辦的為最多，著論及譯述等文件也很不少，這真是社會主義的功臣”。他甚至承認這是“我們最早提倡社會主義的革命黨人所不及的”。^⑪不過，茅盾所說的“大轉彎”也並非空穴來風，“梁啟超系”對社會主義的態度確有改變。以該系機關刊物《解放與改造》為例，該雜誌原以討論、宣傳社會主義為職責，高談主義而不重具體問題之研究、解決。然而，1920 年梁啟超、蔣百里等人歐遊歸國，接收並整頓《解放與改造》，不再以社會主義為倡導，從原先的高談主義，轉為研究具體的問題。^⑫換言之，在 1920 年之後，“梁啟超系”對社會主義的倡導的確沒有前期那般積極，但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轉變之後，是不是已到“反對社會主義”的程度，又或者是在何種層次上“反對社會主義”？

茅盾記憶中“大轉彎”的標誌是張東蓀發表短評。1920 年 10 月，張氏隨同當時在華講學的羅素（Bertrand Russell）赴湖南等地演講，歸上海後於 11 月 6 日發表時評《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社會主義論戰由此而起。在前期論戰中，“梁啟超系”一方以張東蓀為主；三個月後，《改造》雜誌刊出“社會主義研究”專號，梁啟超、藍公武、蔣百里、張東蓀等均撰寫長文，大舉參與到社會主義論戰之中。1921 年 9 月，張東蓀等人更創辦《社會主義研究》，持續參與討論。^⑬正如張東蓀自己所說，他“作了一個小小的短評，引起了無邊的風浪”。^⑭

在最初的短評中，張東蓀一則引舒新城“中國現在沒有談論什麼主義的資格，沒有採取什麼主義的餘地，因為中國處處都不夠”，再則說“空談主義必定是無結果”，三則說要使中國人“都得著人的生活”，努力方向“不是歐美現成的什麼社會主義、什麼國家主義、什麼無政府主義、什麼多數派主義等等”。最後歸結到“救中國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增加富力”。^⑮在一年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中，張東蓀傾向主義，甚至撰文解答“我們為甚麼要講社會主義”^⑯，他此時在短評中雖未明言，但對主義不無保留的態度，足以引人猜疑，成為他們“反對社會主義”或“歡迎資本主義”的證據。

李達直接認定，時評的發表標誌著“張東蓀現原形”，即拋棄了談社會主義的“假面具”，轉而“不講社會主義去開發實業”了。^⑰邵力子則諷刺張東蓀“曾經說明為什麼要主張社會主義，忽然又說社會主義不當主張”。^⑱陳望道則據此意識到張東蓀不僅不再讚美、鼓吹社會主義，“反而忍心詛咒”，推測“這時評就是轉向的宣言”。他繼而追問：“你現在排斥一切社會主義”，那所謂“開發實業”，便只能用“資本主義”，“你以為‘救中國只有一條路’，難道你居然認定‘資本主義’作唯一的路嗎？”^⑲在李、邵、陳三人的表述中，張東蓀對社會主義的負面態度在程度上稍有不同，“不講社會主義”主要還是自己不講；“不當主張”則自己不講之外，似乎也不贊成別人講；而“詛咒”社會主義，那無疑已是反社會主義了。其實從“開發實業”到“反對社會主義”中間有著至少兩重推論。李漢俊將其總結為：“因為要使這些人能夠營‘人的生活’，就想到要發展實業；因為要發展實業，就主張資本主義；因為要主張資本主義，於是就反對社會主義。”^⑳

在當時思想界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已成相對待的道路，有“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的趨勢，陳獨秀便說：“吾人生產方法除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外，別無他途。”^㉑對於張東蓀是否主張資本主義，陳望道還稍有疑問，但署名“愛世先生”的《正報》記者卻指出張氏“雖不明言崇拜資本主義，其實所謂不講主義只講發達實業，結局自然要歸到資本主義上面去”，並且“若說中國人不配講社會主義，倒不如向資本主義下去討生活，正如有人說中國民智不夠共和，還是復辟的好”。^㉒五四時期，在經歷過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之後，輿論界對於復辟可謂深惡痛絕。而在“愛世先生”的敘

述中,社會主義應取代資本主義,猶如共和取代帝制一樣正當,換言之,若當時還主張資本主義,簡直像“復辟”一樣罪惡深重。邵力子結合陳獨秀與“愛世先生”兩者的邏輯,表述更為清晰,他說:“開發實業只能在兩種主義之下,一種即社會主義,一種即資本主義,沒有第三條路。東蓀既以為談社會主義無結果,則和鼓吹資本主義還有什麼分別呢?”²³稍後陳獨秀更直接挖苦張東蓀“新受洗禮的資本主義”。²⁴

在時人認知中,張東蓀的言論“是代表研究系的”,甚至被視為“背著一系底號褂,搖著一系底旗,吶著一系底喊聲,做了一系底發音機”²⁵,故對張東蓀的定性也很快擴展到“梁啟超系”全體。費覺天在讀完《改造》雜誌的“社會主義研究”專號後,一則說藍公武“所以反對社會主義者,以為社會主義就是要求分配平等”,再則說“所謂反對社會主義運動最有力的論據,如任公先生底政治不完善,一湖先生底缺少資本,無訓練的勞動等等”,三則說“諸公之反對社會主義運動主張固對,所可惜者中國與世界不能分離也”,總之,“梁啟超系”諸公“徒碌碌然反對社會主義”。²⁶蔣百里替其概括為:在“估定各人議論之後,對於各人下了一個總結,說‘反對社會主義運動’‘歡迎資本主義’”。²⁷“梁啟超系”反社會主義的認知很快被廣為分享,遠在法國的蔡和森雖“兩方駁論未得而見”,但已聽聞陳獨秀“主張社會主義而張東蓀歡迎資本主義”。²⁸稍後,鄭摩漢也說“張東蓀、藍公武、蔣百里等諸先生”在“民國八九年即《解放與改造》時代,非常提倡社會主義;到了本年春季即《改造》雜誌時代,忽和他的首領梁任公先生,大開論壇,極力歡迎資本主義”。但有意思的是,幾天後他又向張東蓀等人解釋,“張蔣藍諸先生有一時期歡迎資本主義”一事,“是聽幾個朋友說的”。²⁹如果說費覺天是在閱讀“梁啟超系”眾人文字後得出的結論,尚屬“所見”;那鄭摩漢與蔡和森相似,所據無疑已是“所聞”與“所傳聞”。這提示出,張、蔣、藍及領袖梁啟超在時人的意識中,確為一整體,且“梁啟超系”反對社會主義、歡迎資本主義的認知,在當時的傳聞中所在多有。

“梁啟超系”對於被定性為“歡迎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一事有過明確否認。在此前張東蓀對於被說成“歡迎資本主義”就十分不滿,曾反問陳獨秀:“先生何以曉得我歡迎資本主義?”³⁰張玉麟也以旁觀者身份為張東蓀鳴不平,認為如果要說他說了“救中國只有一條路”這句話“就是替資本主義效力,從此完全把社會主義的思想丟開,做一個新受洗禮的資本主義者,未免言過其實”。³¹蔣百里看到費覺天的定性後特意撰文申明“我自己的態度是要用我自己的話來表明的”,明確否認了費覺天對他“反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定性,說:“這個斷案,我是不承認的。不僅是我,就是東蓀,他不是明明說‘資本主義必倒,社會主義必興’,又說‘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總當認為最後標的,宜努力隨著各民族的共同研究去創造’麼?試問努力創造是不是反對社會主義運動?”³²實際上,即使轉向之後,在梁啟超諸人的自我認知中,他們的主張也並非反對社會主義。

梁啟超雖承認自己那兩年有“彷徨悶索”,但對於社會主義本身之何去何從並無質疑,反而“確信此主義必須進行”;幾年後,他仍認為自己“總算得社會主義政策的一個信徒”。³³張東蓀在論戰中對於趨向於社會主義者,也反復以“我們”相稱,如他對友人稱“我們必須積極地研究社會主義”,且“將來世界必行社會主義”,故“中國此後之國是當以社會主義之目的為目的”。³⁴蔣百里則認定“對於社會主義四個字所切緊的問題”已經不是“應不應”宣傳的問題,而在於怎樣宣傳。³⁵

不僅如此,在“梁啟超系”的社會改造方案中,社會主義正是其構想未來型範的思想資源之一。例如,在宣布他們自己一派的方針時,“梁啟超系”同人“確信經濟改造在使人人由勞動而得生存權為最低限度,同時對於自由競爭定有最高度之制限,則去其過甚之兩端,既不抹殺智能之高下,復不致有生計壓迫之現象”;並且主張“對於土地及其他生產機關,宜力求分配平均之法”,更要“一面注

重分配，一面仍力求不萎縮生產力，且加增之”。^③這正是在勞動權、土地與生產資料所有權、生產與分配等方面均參酌了社會主義的精神。但在實現手段上，他們一方面不認為可以跳過資本主義階段實現社會主義，同時也不讚成以激烈的革命手段實現社會主義。^④

然而，梁啟超等人無論是在言語中對社會主義的支持，抑或是對反社會主義者形象的否認，都未能改變時人的眼光。費覺天在看到蔣百里的聲明後說：即使“那大吹大擂地反對‘反社會主義運動的’費某承認，說蔣先生們並不是反對社會主義，也未曾為資本家辯護，歡迎資本主義”，但其他“旁邊的人，看報的人，未必就相信，說蔣先生們是真個如此”。^⑤甚至於在張東蓀稱“我們”時，邵力子直接否認，說：“這一個自認‘無力’的‘我們’，請東蓀君劃分得清楚些，不要把‘趨向於社會主義者’無故牽率在內啊！”頗有一種要將張東蓀趕出“我們”之意味。^⑥如果說費覺天的態度尚是存疑或不信，邵力子分明就是認為張東蓀他們“不配”自稱為“趨向於社會主義者”。

概言之，在社會主義論戰前後，“梁啟超系”人物的自我認知多為傾向社會主義者；而在同樣以社會主義者自居的對手方的認知中，他們卻又“是社會主義的障礙”，是“敵人”。^⑦之所以有如此鮮明的反差，是因為論辯雙方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以及什麼是論辯焦點的認識本就不同。從對手方角度而言，這是一場社會主義者與反社會主義者之間“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而“梁啟超系”則認為這是不同派系的社會主義者“關於 Bolshevism 的討論”，雙方實處於失焦的論辯之中。

二、失敗的聚焦：“社會主義的討論”抑或“Bolshevism 的討論”？

在社會主義論戰中，藍公武注意到，社會主義這一名詞，輸入中國雖“將近有二十年”，“但是中國真正有人研究社會主義，卻在最近的兩年中”，其原因“自然是大戰的反動，俄國大革命的影響”。^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大戰的反動”所推動的是作為資本主義對立面的廣義的社會主義，而受“俄國大革命的影響”所興起的主要卻是狹義的布爾什維克主義。這加劇了五四時期社會主義思想的紛繁複雜。瞿秋白觀察到，當時社會主義的討論雖常常引起他們無限的興味，但是就像“隔著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的”。^⑨藍公武同樣認為當時“社會主義的派別極多，往往同一派的人意見又各自不同”，故而“要概括的說，社會主義是什麼，本是一件極難的事”。^⑩如此紛亂的狀況曾一度困擾思想界。

胡適在五四後注意到，同是“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⑪胡適正是因各方在同一名詞下顯得過於“相近”，才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予以“區分”。^⑫與胡適相似，惲代英也認為“所謂社會主義這名詞，本體便向來沒有什麼很精確的界說。高到安那其、布爾塞維克，低到安福系、王揖唐所稱道，都有些可以合於通行所謂社會主義的意義”。^⑬

在胡適、惲代英的表述中，“你的”社會主義、“我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是並立的，都可以是社會主義的不同表現形式，“都有些可以合於通行所謂社會主義的意義”。如就此情狀推論，正因社會主義有不同派、同一派中又有不同意見，則社會主義論戰既可能是社會主義與反社會主義的論戰，也可能是社會主義不同派別之間的論戰，還可能是同一派中不同意見的論戰。

論戰開始未久，對於張東蓀不就社會主義直接表態，卻忽而說到“中央集權”，忽而又說到“教育”，邵力子就曾提醒，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做明確選擇才是“辨論的焦點，此外都是橫生枝

節”。⁴⁷而論戰持續近月後，陳獨秀又選取《時事新報》與《民國日報》中相關材料，以“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為題轉載於《新青年》第8卷第4期。顯然，在陳獨秀一方看來，論戰的焦點就是支持與反對社會主義之爭。然而，張東蓀看到陳獨秀所定標題後提出質疑，認為“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這一題目“很不切”，蓋“社會主義四字太寬泛了”，應當改為“關於 Bolshevism 的討論”，那樣“方有集中點”。他解釋論辯失焦的原因，是“大家最初並未預備討論，甲不過隨便說幾句，乙也不過隨便駁幾句，一方面沒有把燒點顯然呈出，他方面自摸不十分清楚”。

張東蓀在此處雖是甲乙並舉，但其實已意識到自己發言過於“隨便”，未能明確呈現“燒點”，並且承認“第一次時評本是匆促作的，自然也有不妥的句子”，正是這些“不妥的句子”讓他陷於貌似反社會主義的尷尬與不利的境地之中。故而他對陳獨秀直言：“先生不肯和我討論意義而肯討論文句，那麼我情願認輸。”言下之意是在“文句”上確有理虧之處。而他所說的“意義”則體現在對陳獨秀的八條質問之中，分別為：

先生是不是主張勞農主義？

先生是不是主張用勞農政府開發實業？

先生是不是主張在銀行團的資本主義大侵入中國以前即起勞農革命？

先生是不是想創造狄克推多？

急進的勞農革命在中國之可能性在何處？

革命之原動力既不是現成的究竟在何處？

革命之支柱者是不是純粹勞動者而絕不與兵相干？

革命之發生大約至早可在何時？⁴⁸

前五條的質問直接與勞農主義、勞農革命相關，後三條也是相關聯的革命原動力、支柱者、發生時間。故至少在張東蓀的認知中，雙方所討論的，不是寬泛的社會主義問題，而是更為具體的勞農主義，即 Bolshevism；甚至是特定的勞農主義在短時期內的可行性問題。⁴⁹

張東蓀之所以要聲明這不是“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而是“關於 Bolshevism 的討論”，是因為在 1920 年前後，社會主義在中國思想界已取得某種“政治正確”的地位，幾乎沒有討論餘地，更不能以反對者的姿態討論。費覺天在 1921 年時便認為，“社會主義之在今日，差不多是天經地義，凡屬頭腦清楚點的，決不會反對”。他在蔣百里澄清之時雖然輕巧地說如果“梁啟超系”沒有“反對社會主義”，那“就是我底斷案下錯了，又何足損蔣先生之秋毫，又何必定要趕快聲明呢？”⁵⁰如果社會主義已居於“政治正確”地位，則一旦被說成“反社會主義”，就成了頭腦不清不楚，不只是“秋毫”問題，豈能不趕快聲明？與之相對，如果把對手方說成“反社會主義者”，在某種程度上已消解了對方的信用，可以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Bolshevism 則不同，在當時雖風氣漸盛，但仍存爭議。

事實上，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這篇短評中，全文未提及 Bolshevism、勞農主義或蘇俄，張東蓀此時提出要將論題定為“關於 Bolshevism 的討論”，已是一種轉移。或是吸取了前一次時評中泛論主義導致論敵將他視為整體上反對社會主義的教訓，張東蓀在短評之後的文字中，確實開始聚焦於勞農主義。他提醒陳獨秀不必“專門挑別人家的自相矛盾點”，應該就論戰的焦點辨析，“須得把題目認清楚”，而他認為的題目是：“能否採取急進的 Bolshevism 的社會革命”。

其實，張玉麟也注意到了話題的轉移，“其始主力軍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方面，現在漸漸移緩進主義與急進主義方面去了”。他又將論辯分作三個層次，即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緩進主義與急進主義，雙方對於前兩者“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區別只在於是否要“抄

近路”。換言之，正因對於要不要開發實業、要不要社會主義並無歧異，所以論辯也自然轉移到“緩進主義與急進主義”之爭。⁵¹

在“梁啟超系”同人中，不只是張東蓀試圖將論戰焦點拉回勞農主義。蔣百里在隨後的討論中，也強調“社會主義是一件事，勞農主義又是一件事”，社會主義雖需要“急做慢成功”，但在當時改革變亂時代，“談勞農主義者又惟恐其多”，一褒一貶，區別對待。⁵²

是否反對社會主義與是否反對勞農主義是兩個相關卻不相同的問題，如果是前者，“梁啟超系”便是在社會主義之外；如果是後者，則有可能是社會主義內部的討論。在張東蓀他們的自述中，雙方的差別源自對社會主義學說的不同理解，是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爭。

論戰開始一星期之後，張東蓀更清晰地表達了他的主張，強調自己一向“傾心於同業公會的社會主義”，認為當時流行的諸多社會主義新說，只有“協社對於現在之中國有實現之可能性，其餘概為空談”；而“真正之勞農主義決不能實行”。⁵³協社即 Cooperative society，與基爾特社會主義有關聯卻又並不完全相同。此時，張東蓀對兩者仍常混同使用，但並未妨礙他旗幟鮮明地急急宣布自己的主張：傾心於同業公會的社會主義（即基爾特社會主義），反對偽勞農主義。之所以需要如此急迫地宣布自己的“主義”，回應的正是對手方所強加給他的主張發展實業就是主張資本主義的指責，申明自己並非主張以資本主義而是以另一種社會主義方式發展實業，以此擺脫被視為是站在資本主義的立場來反對社會主義之困境。到 1921 年 9 月創辦《社會主義研究》後，張東蓀等人更直接宣言：“我們懷抱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思想，豎起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旗幟，在《社會主義研究》發刊的第一天，宣言我們是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其中有著鮮明的“我們”與“他們”的區別，且“我們”是“立著基爾特社會主義原理上，批評別派的社會主義”。⁵⁴張東蓀自認這是“高標社會主義者的頭銜”，並且與“俄國式社會主義”對舉，說“不單我們主張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是有極深厚的理由，並且那主張俄國式社會主義的人也另有作用”。⁵⁵雖是對峙，但仍是一派社會主義與另一派社會主義的對峙，是將論戰雙方的異同置於社會主義大框架之下。

與蔡和森將論戰視為陳獨秀“主張社會主義而張東蓀歡迎資本主義”不同，陳嘉異看到的則是張東蓀自前一年來“顯揚基爾特社會主義以與倡勞農過激派者相離異”，是其“因主張基爾特社會主義與勞農專政派相筆戰”。⁵⁶稍後有無政府主義者稱“國內思想界的分野，就我目睹的論是：（一）布爾塞維克主義、（二）基爾特社會主義、（三）無政府主義”，並向“各派社會主義者”呼籲：“朋友們！我們在目標上沒多少差別；優善的目標，是大家承認的。我們不同的焦點，是‘社會究當怎樣改造？’一題。慢性的呢？急性的呢？”此處所謂“慢性”的改造方案是指基爾特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而“急性”的則指布爾塞維克主義。同時，他特意聲明，“這個‘我們’是包括著所有各派的社會主義者”，且均是“同志們”。⁵⁷

實際上，在費覺天看來，“關於社會主義爭論問題”分歧的關鍵點就在於“是否能越級而進”，即中國能否不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而進入社會主義。⁵⁸這正是當時思想界最為關注的議題。羅素訪華時，楊端六就曾向他反復提問：中國要“發達實業”，能否“跳過資本階級”，以及“不經過資本階段而能振興工業”是否有過先例？而羅素則回答說：“中國要全然不經過資本階級，恐怕不可能”。⁵⁹李大釗也注意到，那時議論的中心問題是“現在的中國能否即刻實行社會主義”。⁶⁰“即刻”兩字最為要緊。即使是整體反對張東蓀的程振基也意識到論辯的核心未必是反對社會主義與否，而應該是“實行真正社會主義，是不是必在資本主義的企業發達之後”，這個問題才是“現今討論社會主義的焦點”。⁶¹他同樣是將論辯視為能否“抄近路”之爭。就此而言，論戰的核心是社會主義實現的“緩”

與“急”問題,而不是“是”與“非”。

若此,那為何原本是社會主義內部的討論,仍會被視為反社會主義?張東蓀發表短評的第二天,邵力子就意識到,字面意思未必是張東蓀的真正用意,故他提問,“這個時評底真正動機究竟在哪裡呢?”^②幾天後,張東蓀也曾反思為何“總有人來反對我”,認為那是因為他說“中國現在只宜講教育與實業而談不到什麼勞農主義”,如果他只是單純地做教育事業,可能“決無人來破壞”,其中的關鍵就在於他的時評談到勞農主義。^③這提示出,在論辯中,雙方雖多泛用社會主義這一名詞,即使將題目定為“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但心中所想常常是更具體的馬克思主義甚至是已在蘇俄實踐的勞農主義。其中的關鍵點正在於社會主義這一名詞含義的廣狹之別。

張東蓀觀察到,當時講社會主義的人,雖則葫蘆裡都想賣國家社會主義這一劑藥,但未必“公然主張”,都是拿社會主義“這四個字來做頭銜”。^④稍後“梁啟超系”就明確指出:“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的學說徹頭徹尾是無產者革命的學說,但在我們看來,社會主義的任務只是提供一種人類生活的新形式。”^⑤“我們”與“他們”的重要區別之一,是雙方眼中的社會主義廣義狹義不同,“我們”的社會主義是泛指,而“他們”的社會主義是特指“無產者革命的學說”。雙方仍在爭奪著社會主義的話語權。不過,在一些時人的表述中,社會主義的核心已逐漸歸於勞農主義,故反社會主義也就有了特定含義,常常特指反勞農主義。

同時,不僅是含義廣狹,反社會主義的特定含義也體現在實行時間上的緩急之別,有時僅是反對立刻實行勞農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勞農主義為四種層次,外延大小不同,在一般認知中,前者大體可以包含後者;同時,反對社會主義與反對立即實行社會主義、反對勞農主義與反對立即實行勞農主義亦有不同,但在論辯中,常常混雜使用。正因社會主義的語義在使用中是游移的,反社會主義的含義也就常有伸縮。其中,反社會主義的定性標準,既可以是贊成暫時以資本方式發展實業,也可以是不支持以勞農主義方式實現共產主義,還可以是不贊成立即實行社會主義運動,更可以是反對立即實行勞農革命。這其中又有一個關鍵問題,那便是社會主義的各派是否能兼容並包,抑或必須排他性地擇定一派、否定其餘?而社會主義論戰雙方的又一區別,則是早期中共黨人將社會主義視為不可商榷的革命信仰,“梁啟超系”則更傾向於視社會主義為有待研究的對象。因此,在中共的革命視角下,“梁啟超系”因不夠革命而成了“反社會主義者”。

三、“反社會主義者”的形成:中共視角下的社會主義論戰

“梁啟超系”原本便是十分鬆散的群體,雖被視為一系,對社會主義的具體態度其實各有不同。李達在讀到《改造》雜誌“社會主義研究”專號的數篇文章後,注意到內中“也有誤解社會主義的,也有同情於社會主義的,也有積極贊成資本主義的,也有恐怖偽勞農主義的”。他其實已意識到這是一個從“同情於社會主義”到“恐怖偽勞農主義”有著豐富色彩的思想譜系。對於此種複雜狀況,原本“應該詳細研究分別討論”,但李達在表示“沒有許多閒暇,做從容的論辯”之後,有意無意將複雜的狀況化約為正負兩方,即“表同情於資本家的與表同情於勞動者的兩派”,成為“社會主義與反社會主義兩方面”。此種營壘分明的狀態,正是李達的期待。在他看來,“現時討論的人越多,越是好現象”,因為只有知識界“旗幟越發鮮明,竭智盡力,各為其主”後,“社會主義與反社會主義兩方面”才能同時發展,“以待最後之決勝”。^⑥

“梁啟超系”各人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和態度其實都是複雜的;更何況,表明對社會主義的態度,未必就是“社會主義研究”專號中論說的主要意圖。但這並不妨礙李達將此專號視為“梁啟超系”

在“表明對於社會主義的態度”。可以說,李達是以自己理想中的營壘分明,來重新看待那原本複雜的討論,並將“梁啟超系”劃歸反社會主義一方。換言之,李達無意於“詳細研究”,而是從信仰的立場出發,“各為其主”,以決出勝負。蓋當時正值 1920 年 4 月,中國共產黨已在籌備過程中,且李達正是其中的重要參與者,而張東蓀恰在當時因反對組織工會問題退出組黨。就此而言,“旗幟越發鮮明,竭智盡力,各為其主”,正是中共早期純粹團體的必要手段。

在中共的組建過程中,宣傳主義是其最重要的工作^⑥,與之相伴的是早期成員思想的釐清與統一。不過,此時的宣傳主義,並非泛稱的社會主義,而是特指馬克思主義。茅盾曾回憶,在組黨過程中,當時的任務之一便是“加強黨員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習”,除了各人自己閱讀外,“每星期有一次學習會”。^⑦正是通過這些學習和交談,“一些當時的馬列主義者,更加明白了蘇俄和蘇共的情況,得到了一致的結論‘走俄國人的路’”。^⑧他們一面學習馬克思主義,同時對其他主義剖析評判。當時集中討論的議題之一便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他所領導的革命運動不夠徹底。而無政府主義又過於空想,沒有實行的方法。其他各派社會主義的議會政策又不能實現於中國,因中國在可見到的將來不會有良好的議會制度”。^⑨陳獨秀當時就經常參加青年團領導機關會議,主要任務便是“與各種假社會主義思潮進行鬥爭”,指出“只有共產主義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⑩“真正的社會主義”一旦確定,其他各種社會主義流派就只能變成“假社會主義”。

類似的理念在中共一大前後的文件中亦有所體現。例如,《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中,在規定“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的同時,特意指出“中國共產黨徹底斷絕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的一切聯繫”。在黨的第一個決議中,也強調要“對現有其他政黨,應採取獨立的攻擊的政策”。^⑪上述文件雖然形成於 1921 年 7 月,但文件內容形成於對事實的應對,故事實與應對方式此前必已存在。或可以說,如何對待其他派系成為中共形成過程中所需要應對的重要問題,相關理念在此前就已影響到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

毛澤東在 1921 年初列舉了“解決社會問題”的五種方法,包括社會政策、社會民主主義、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但他認為:

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

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故最宜採用。

有意思的是,毛澤東將當時“國中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的方案分成兩派,“一派主張改造,一派則主張改良。前者如陳獨秀諸人,後者如梁啟超、張東蓀諸人”。^⑫在用詞上,毛澤東所使用的“改造”與“改良”相對中性,而非革命、反革命或社會主義、反社會主義那樣黑白分明,但其中的取捨仍然是明確的,即選擇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勞農主義的方法,而否認其他社會主義形式。

毛澤東在那時雖選擇“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卻仍認可改良在“補綴”上的意義,否定其他派別的同時,卻又未見對其他派別取積極的進攻態勢。與毛澤東相比,當時尚在法國的蔡和森更為激進,他自稱為“極端馬克思派,極端主張:唯物史觀,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因此,他“對於初期的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共產主義,不識時務穿著理想的繡花衣裳的無政府主義,專主經濟行動的工團主義,調和勞資以延長資本政治的吉爾特社會主義,以及修正派的社會主義,一律排斥批評,不留餘地”。在他看來,這些派別都是阻礙世界革命的障礙物。他進而宣稱“社會革命與染有中產階級色彩的思想家和被中產階級學說、教育、勢力熏壞的改造家全無干涉”。^⑬蔡和森將馬克思主義之外

的其他社會主義，將馬克思派以外的社會改造家排斥在了社會革命之外。在他的分類中，“梁啟超系”顯然是一種障礙，在“深惡痛絕”之列。毛澤東、蔡和森的思路一脈相承，恐非偶然。事實上，若仔細梳理，會發現當時將“梁啟超系”定性為“反社會主義者”的勢力中，最主要的便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換言之，早期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論戰中對“梁啟超系”的反駁，其實是一種有組織行為。

1921年7月，北京共產主義組織在中共一大報告中提到：“當羅素教授在上海講學，並宣傳基爾特社會主義時，我們組織了公開辯論，並作為其論敵發表了意見。”^⑤陳望道也記得在黨的宣傳工作方面，當時鬥爭的對象“主要是張東蓀等的《時事新報》和胡適的《努力》”。^⑥李立三則指出，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這個時期思想上有兩個重要的鬥爭”，其中之一便是“和《解放與改造》的鬥爭”。^⑦就此而言，論戰本身便是中國共產黨“在知識分子中的宣傳工作”的一部分。李達後來回憶：

當時梁啟超派辦了一個名叫《改造》的雜誌，登載了反對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的文章（題名我忘了），同志們認為必須予以駁斥，推我寫一篇文字。我作了一篇題為《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的文章，發表在《新青年》月刊上。據各地同志說，那篇文章頗有積極效果。^⑧

在李達的回憶中最能看到，論戰的展開是因為“同志們認為必須予以駁斥”，而李達自己參與論戰，也是由黨內同志們“推我寫一篇文字”，並且，這場論戰“各地同志”都有關注。

正是在此次論戰中，李達看到梁啟超《覆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一文後，意識到該文“立論似多近理，評議又復周到，凡是對於社會主義無甚研究的人，看了這篇文章，就不免被其感動，望洋興嘆，裹足不前”，他旗幟鮮明地揭破梁啟超“明明主張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達聲明是“為忠實主義起見”，故“認定梁任公這篇文章是最有力的論敵”。按照前後文理解，李達所說“為忠實主義”，似乎是他自己忠實於社會主義，但實情或許更為複雜。如果李達參與論戰，代表的是中共早期的“同志們”，那所忠實的“主義”，也便是黨的主義。

李達也承認“梁先生的目的，可說是非常遠大”，但認為手段不僅“迂緩固不待言”，“而且這也不算是什麼革命的手段，實不過是改良主義的社會政策派的勞動運動罷了”。所以，在李達看來，梁啟超主張“在獎勵生產的範圍內為分配平均之運動”，只不過是“主張貧人丐富人恩惠以謀生的運動，只可說是乞丐的社會主義運動”，他首先就不承認。從勞農主義的立場出發，其他社會主義流派——包括“梁啟超系”的“乞丐的社會主義運動”，也就有可能成了“反社會主義”。^⑨

有意思的是，早期的共產主義者許興凱，對於共產主義者之所以在論戰中反駁張東蓀等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有自己的理解，他以為那是因為“共產主義者所視為朋友的，都移動了他們底目標，轉而攻擊共產主義了”，“自稱為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所撰的《社會主義研究》，也偏重於攻擊共產主義的方面”。面對攻擊，共產主義者才不得不“把他屢次欲言而止的話說一說”。換言之，這是一種被攻擊時迫於無奈的反駁，並且還要聲明“我今天和我們底朋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討論一討論”。末了，他不無警告意味地喊話基爾特社會主義者，認為他們“鼓勵一種辦不到的主義，作一個衛生的革命賣文者，本沒有什麼大妨礙”。但是如果“天天的肆行攻擊那光明一線的可行的主義”，使資本家、軍閥派等反動勢力“暗中得了極大的利益，我們是不能永久取放任的態度的”。^⑩

對於這一批評觀點，張東蓀也認為“是有價值的且合於研究的態度，不是時流罵人式的文章”。^⑪張東蓀所承認的大概便是許興凱文章中對論戰的定位——是各派社會主義者“朋友”間的討論。如果就正負兩分而言，許興凱的立場顯然更貼近中國共產黨一邊。他的理解最能說明，即使是論戰雙方，朋友或敵人的定性仍然有不同的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許興凱雖曾參加北京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且當時已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然而在思想覺悟上似乎尚未與組織保持統一，敵我觀念不如李達清晰。或是受到組織的某種提醒，他很快意識到此前的論述過於溫和，故在數天後態度一變，雖仍承認“現在國內的改造論者有三種不同的意見”，除“共產主義之外，則有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但已斷言“無政府主義者是沒有方法的”，而基爾特社會主義“完全是不可能的”，而且，正因這二者不可能，故它們的倡導者“迷信一種空想而妨礙一種可能的主義的進行，使人類的黑暗、苦痛……得以延長，實在是一種害人的東西”。^⑩許興凱此前尚認為各主義“無妨並行不背”，只有在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主動“天天的肆行攻擊那光明一線的可行的主義”時，才是“大妨礙”，但此時，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對自身主義的倡導本身便是“妨礙”，是“害人的東西”，蓋其存在便會產生消極影響。對於這一轉變，張東蓀大失所望，表示“決不再和新凱君討論了”。^⑪

在社會主義論戰中，中共黨人除駁斥“梁啟超系”之外，也在與無政府主義者論戰，他們對待兩者的立論思路異曲同工。《先驅》發刊詞中就批評無政府主義者說：“在一個時候，改造社會的方法是只有一種的，他們反對那一種最合於環境的要求的改造方法而不諳實際的傳播一種高調的主張，便是使一般人入於歧路，分散對敵人的力量，而我們的理想社會也終於不能達到了。”因為無政府主義者“不明白實際情形，他們的努力不知不覺的就變成盲目的和反動的”，其“罪惡在實際上與反動派保守派沒有什麼分別”。不過，無政府主義者雖“反動”，但仍可“原諒他的心跡”，而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則等而下之。^⑫

施存統便說，對於“無政府主義者，如果不攻擊我們，我是承認在某程度以內是可以並行不背的”，而“對於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本也可以對無政府主義者態度對之”，但“渠們攻擊共產主義，實是勢所必然”。所以，施存統對於許興凱將基爾特社會主義者視為朋友的做法明確反對，直截了當反駁：“我可以自白：我老實不承認這種人是我們底朋友。”他決絕地說：

我們底態度、主張，是決定了的，是不能絲毫讓步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勞工專政，在我們是無商量之餘地的。……從基爾特社會主義底本質上看來，反對共產主義乃是當然的事情。所以我只看見主張基爾特社會主義為的是替資本家張目，沒有看見可以“並行不背”的道理。要想“並行不背”除非渠們也主張階級鬥爭、勞工專政、暴力革命；但這已不是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了。

在施存統看來，張東蓀他們倡導的基爾特社會主義“是一種漸進的、改良的方案，不是急進的、革命的政策”，並且“主張基爾特社會主義底結果，勢必要去贊助資本主義，延長資本主義底壽命”，所以“主張基爾特社會主義，就是主張資本主義底別名”，也就成了社會主義的敵人。^⑬

在這樣的對立思維中，“漸進的、改良的”社會主義與“急進的、革命的”社會主義已水火不容。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先驅》對中國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總結便為“是非革命的”、“就是資本主義”、“不主張國家經營產業的”、“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尤其是“非革命”一條，其結果只是“冒著改造的招牌，暗中延長舊社會的命運”，所以“社會主義的第一步工夫就是‘革命’”。^⑭而李達提到“梁啟超系”的改造方案“不算是什麼革命的手段”，已經開始用革命與否來判斷一種社會主義方案。

或許受到施存統的啟發，許興凱很快領會到黨組織的“信條”，在之前的態度轉變後更進一步，認為只有“急進的、全部的、徹底的改造”才能叫做“革命”，而且，他“相信惟有革命，社會主義才能達到”，所以“革命為第一義”，“革命為社會主義的靈魂”。換言之，“反對革命，就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實現，就不是社會主義”。^⑮如果說《先驅》提到的“非革命”中的“革命”還只是特指作為實現社會

主義第一步手段的暴力革命，而許興凱此處所說的革命就具有更成體系的含義，也包含著“國家經營產業”、“無產階級專政”。按此推論，“革命”成為社會主義與否或反社會主義與否的標準，只有“急進的、革命的”社會主義才能稱為社會主義。既然“梁啟超系”的“漸進的、改良的”社會主義“不主張革命”，也就不是社會主義，且是反社會主義了。

進而言之，李達說梁啟超文章“立論似多近理，評議又復周到”，而其目的又“非常遠大”，最能說明“梁啟超系”與共產黨人在思維方式上頗有相通之處，區別只在於手段迂緩。然而，對於共產黨人而言，那已是一個行動的時代，即使思維方式上再多的共識，也不能消除在行動上——是否立即著手革命——的不同選擇，而且雙方還面對著爭奪追隨者的競爭。就此而言，“梁啟超系”立論越近理，則其對中共行動的影響越大，即讓潛在的革命追隨者“望洋興嘆，裹足不前”。正因此有此潛在影響，所以陳望道的第一反應才會是“我怕東蓀君轉向，社會更要沉靜”；^⑧而李達在反駁張東蓀之初就特別注意到，“他們不說中國人要準備知識，學會了社會主義，好行社會革命；便說要助長資本主義的發達好談社會主義”，這類“似是而非的論調”，在那時“最易淆惑人心”。^⑨

李季的看法與李達相似，他看到當時“一班自命為穩健派的新頑固黨”不單“不要社會主義”，反要“提倡資本主義去發達中國的實業”。“自命為穩健派的新頑固黨”一語意味深長，“穩健派”顯然是“梁啟超系”的自我定位，但在激進的世風之中，卻被定位為“新頑固黨”，有著鮮明的反差。同時，他們所根據的理論恰來自馬克思，認為：“世界上並沒有不經過資本階級而能達到社會主義的，如俄國未經過資本階級，所以很難成功。中國若想社會主義的實現，不得不提倡資本主義。”在李季看來，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調”頗有影響，“雖不足以欺有識的人”，但是“一班老頑固見了，必定興高采烈”；“一班資本家見了，必定歡天喜地”；“一班腦筋簡單的青年見了，必定為它所惑，對於社會主義不肯加以研究；就是一班歡迎社會主義的青年見了，也未必不呈一種徘徊歧路和裹足不前的狀態”。正因此，這樣的莠言“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的運動將發生一種阻力了”。^⑩

李季所擔心的“徘徊歧路和裹足不前”與李達所謂的“望洋興嘆，裹足不前”在用詞上十分相似，更可見他們所看重的乃是“梁啟超系”那使社會沉靜和淆惑人心之社會影響，而主要並非思想與理論的是非。因此，社會主義論戰看似是理論論戰，但其實更多是社會主義本身的實踐問題，是要不要在當時立即實行蘇俄式的勞農主義革命的問題，這才是兩派最根本的區別，也是共產黨人認為“必須予以駁斥”的原因。

結 語

在社會主義論戰之前，張東蓀就意識到應區分“抽象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和在中國“講社會主義的人”。^⑪這提示出，名相的使用本身就是其社會實踐的一種方式，當其從抽象概念被“在地化”為各式各樣的具體“社會概念”之後，其意義也會產生一定程度的變化。^⑫換言之，在中國“講社會主義的人”口中所講的社會主義，不必等同於（甚或不能等同於）“抽象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因此需要予以區分。然而，在現實中，“在地化”的社會主義又常常自覺不自覺地宣稱自己便代表著“抽象的真正的社會主義”，進而壓倒其他“在地化”的社會主義。常乃惠曾將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稱為“共產主義的蔓延”，而其最主要的表現便是共產主義“將一切社會主義的異派都壓倒了”。^⑬其中，社會主義論戰無疑是壓倒異派過程中最重要的節點之一。

在社會主義論戰中，邵力子曾將“現在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分成兩種，一種是“認定社會主義為有危險性質，看做洪水一般，不想疏導，而想湮塞”，另一種是“並不敢反對社會主義的本身，只說社

會主義必應用於產業十分發達以後，中國現在還沒有這樣程度”。在他看來，在社會主義已“彌漫一時”的情況下，“反對社會主義的本身”的言論“愚而無知”，不會產生什麼社會影響，可以“不去說他”；反而是那些並未“反對社會主義的本身”，卻“硬說社會主義在‘現在’決不需要，只可待之‘將來’”的觀點“似是而非”，因具有迷惑性，所以“必須加以辨明”。^④邵力子的表述提示出，即使是反社會主義者，也有不同層次。更何況，所謂“不敢”其實是一種心理動機，其外在表現仍不是“反對社會主義的本身”。換言之，邵力子是將不反對社會主義本身而認為“只可待之‘將來’”的言論，說成了“反對社會主義”。同時，邵力子反“似是而非”而不反真正“反對社會主義的本身”的言論這一行為，表明他更在意的並非是對方言論在思想層面的是非，而是其有無消極的社會影響。故在辨析“反社會主義者”的定性時，表述背後所隱藏的思維方式，至少與表述所呈現的觀點同樣重要。

李達在社會主義論戰進行之時曾注意到，勞農主義的蘇俄成立後，“勞動專政一層”曾“惹起了全世界各方面的非難”。其中“非社會主義的人反對社會主義，乃是必然的道理”，他們甚至“可以不必計較”。而最奇怪的地方，“莫如社會主義者反對社會主義，尤莫如馬克思社會主義者反對馬克思社會主義”。^⑤

梁啟超在論戰國諸子時也曾提出：“諸家學說，交光互影，必以某氏隸某家，欲其名實適相應，蓋戛戛乎難。”^⑥五四時期社會主義論戰的情況正是如此，如果只將論戰視為“非社會主義的人反對社會主義”，不僅未得論戰全貌，更可能只看到了當年“可以不必計較”的部分，而遺忘了更重要的“社會主義者反對社會主義”“馬克思社會主義者反對馬克思社會主義”；又或者是將後兩者誤作“非社會主義的人反對社會主義”。無論何種，都是將濃淡不一的思想光譜變成了黑白分明的圖景，而遺忘了其中交光互影的樣態。

進而言之，在近代中國人急迫的救亡心態下，改造方案常常帶有唯一性與排他性，即“在一個時候，改造社會的方法是只有一種的”。同時，五四時期的各種改造方案，在時人認知中本就有高低、難易、緩急之別，如惲代英隨意表述中的“高到安那其、布爾塞維克，低到安福系、王揖唐”，布爾什維克主義在光譜中的核心地位正逐漸形成。社會主義論戰便發生於這一形成中的時代語境裡，又進一步促進布爾什維克主義成為那“只有一種”的改造方法，其他非社會主義、非俄國式的勞農主義、非立即實行勞農革命等改造方案則一律被視為“反社會主義”。後來茅盾回憶說：“研究系不說反對馬克思主義，而是以假社會主義反對真社會主義，他們鼓吹基爾特社會主義和費邊社會主義，企圖魚目混珠，欺騙青年。”^⑦實際上，“反社會主義者”形成的過程，與“真社會主義”正統地位的建立過程一體兩面，當俄國式布爾什維克主義被確立為“真社會主義”的“珠”的地位（無論是個人思想、黨派話語或社會心理），則其他社會主義方案便只能是“假社會主義”，都成了混珠的魚目。

〔本文初稿承清華大學李欣然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瞿駿教授糾謬，謹致謝忱〕

①對於“社會主義論戰”，時人多稱之為“社會主義討論”，二者不無差別，從“討論”到“論戰”，本具有後人有意無意強化對立的一面，今從俗，仍以“社會主義論戰”稱之。關於社會主義論戰的既有研究，可參見周策縱：《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知識革命》，陳永明等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

年（按：英文版初版於1960年），第226～236頁；彭明：《五四運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66～585頁；陳旭麓編：《五四以來政派及其思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4～141頁；蔡國裕：《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中國社會主義論戰》，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楊奎松、董士偉:《海市蜃樓與大漠綠洲——中國近代社會主義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1~191頁。

②因“梁啟超系”主要成員多與憲法研究會有過關係,且梁啟超更是憲法研究會領袖,所以時人和後世研究者也多以“研究系”指稱。另,在社會主義論戰中,“梁啟超系”一方實以張東蓀參與最深、最久,而其社會主義思想與其他同人未必全然一致,但在時人認知中,張東蓀的言論具有派系意味,代表著“研究系”整體。故本文在討論時人認知時,不特意區別張東蓀與“梁啟超系”其他同人內部的思想差異,對此種差異的具體展開,將另文處理。有關“梁啟超系”與新文化運動之關係,可參見周月峰:《另一場新文化運動——五四前後“梁啟超系”再造新文明的努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

③汪信硯主編:《李達全集》第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7頁。

④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53頁;彭明:《簡評“五四時期期刊介紹”》,北京:《人民日報》,1959年3月7日;彭明:《五四運動史》,第567頁;葛懋春:《“五四”時期的社會主義問題論戰》,濟南:《山東大學學報(歷史版)》,1961年第2期。其他持相似立場的研究有:譚雙泉:《關於1920—1921年的“社會主義論戰”》,長沙:《湖南師院學報(社會科學)》,1962年第1期;丁守和:《“五四”時代的號角〈新青年〉》,北京:《人民日報》,1979年5月2日。

⑤蔡尚思:《梁啟超後期的思想體系問題——孔家店的新老闆》,上海:《文匯報》,1961年3月31日;《文匯報討論梁啟超思想體系的階級性問題》,北京:《人民日報》,1961年4月11日;《復旦大學歷史系討論梁啟超思想評價問題》,上海:《文匯報》,1961年6月13日。

⑥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台北:食貨出版社,1981年,第190~195頁。

⑦“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課題組:《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4~5頁;應學犁:《梁啟超在

二十年代初社會主義問題爭論中的角色》,南京:《南京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崔志海:《梁啟超與五四運動》,北京:《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此外,關於梁啟超等人對社會主義態度的研究還有:潘光哲:《張君勱對社會主義體制的觀察》,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中國近代史上的社會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森川裕貫:《政論家的矜持:章士釗、張東蓀政治思想研究》,袁廣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37~157頁;高波:《追尋新共和:張東蓀早期思想與活動研究(1886-1932)》,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第254~294頁。

⑧摩漢:《評〈社會主義研究〉底宣言》,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第5號(1921年10月26日)。

⑨費覺天:《再論“政治支配經濟策”》,上海:《民國日報·覺悟》,1921年10月25日。

⑩茅盾:《茅盾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8頁;茅盾:《茅盾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6頁。

⑪馮自由:《中國社會主義之過去及將來》,上海:《民國日報·覺悟》,1920年1月16日。詳見周月峰:《另一場新文化運動——梁啟超諸人的文化努力與五四思想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總第105期(2019年9月);周月峰:《響應與批評:五四運動前藍公武與〈新青年〉同人的互動》,北京:《中共黨史研究》,2021年第6期。

⑫周月峰:《從革命到改良:整頓〈解放與改造〉與“梁啟超系”的漸進取向》,上海:《學術月刊》,2021年第12期。

⑬有關“梁啟超系”參與社會主義論戰的具體過程與思想轉變,擬另文處理。

⑭東蓀:《一個申說》,北京:《改造》,第3卷第6號(1921年2月15日)。

⑮東蓀:《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上海:《時事新報》,1920年11月6日。

⑯⑰東蓀:《我們為甚麼要講社會主義》,北京:《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7號(1919年12月)。

⑱江春:《張東蓀現原形》,上海:《民國日報·覺悟》,1920年11月7日。江春即李達。

⑲力子:《真和假》,上海:《民國日報·覺悟》,1920

年11月22日。

①⑧望道：《評東蓀君底“又一教訓”》，上海：《民國日報·覺悟》，1920年11月7日。

②⑩漢俊：《社會主義是教人窮的麼？》，上海：《新青年》，第9卷第1號（1921年5月1日）“隨感錄”。

③⑪《短言》，上海：《共產黨》，第1號（1920年11月7日）。

④⑫《正報記者愛世先生〈人的生活〉》，上海：《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年12月1日）。

⑤⑬力子：《辯論者底態度》，上海：《民國日報·覺悟》，1920年11月23日。

⑥⑭《獨秀覆東蓀先生底信》，上海：《新青年》，第8卷第4號。

⑦⑮茅盾：《茅盾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22頁；漢俊：《冤哉枉也！——抨擊張東蓀先生的人們！》，上海：《民國日報·覺悟》，1921年8月14日。在李達記憶中，陳獨秀便認定張東蓀是研究系的，頗有舊政客的臭味。汪信硯主編：《李達全集》第十六卷，第1~2頁。

⑧⑯費覺天：《關於社會主義運動問題致藍志先先生書》，北京：《改造》，第3卷第10號（1921年6月15日）。

⑨⑰蔣百里：《一個附白》，北京：《改造》，第3卷第10號。

⑩⑱蔡和森：《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無產階級》，上海：《新青年》，第9卷第4號（1921年8月1日）。

⑪⑲摩漢：《評〈社會主義研究〉底宣言》，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第5號；《答反響》，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第6號（1921年11月6日）。

⑫⑳東蓀：《答覆兼反問》，上海：《時事新報·學燈》，1920年12月8日。

⑬㉑玉麟：《旁觀者言》，上海：《時事新報·學燈》，1920年12月15日。

⑭㉒蔣百里：《一個附白》，北京：《改造》，第3卷第10號。

⑮㉓梁啟超著，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62頁。

⑯㉔東蓀：《一個申說》，北京：《改造》，第3卷第6號；東蓀：《國是》，上海：《時事新報》，1921年2月13日。

⑰㉕百里：《我的社會主義討論》，北京：《改造》，第3卷

第6號；百里：《社會主義怎樣宣傳》，北京：《改造》，第4卷第2號（1921年10月15日）。

⑱㉖《發刊詞》，北京：《改造》，第3卷第1號（1920年9月15日）。

㉗有關五四前後“梁啟超系”的改造方案與社會主義思想資源關係的初步討論，可參見周月峰：《型範未定的改造：1920年代前期“梁啟超系”的新文化方案》，長春：《社會科學戰線》，2023年第9期。

㉘㉙費覺天：《答蔣百里君》，上海：《評論之評論》，第1卷第4號（1921年12月15日）。

㉚力子：《心與力》，上海：《民國日報·覺悟》，1920年12月22日。

㉛㉜江春：《社會革命底商榷》，上海：《共產黨》，第2號（1920年12月7日）。

㉝㉞藍公武：《社會主義與中國》，北京：《改造》，第3卷第6號。

㉟㊱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第26頁。

㊲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北京：《每週評論》，第31號（1919年7月20日）。

㊳羅志田：《因相近而區分：“問題與主義”之爭再認識之一》，北京：《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㊴惲代英：《論社會主義》，北京：《少年中國》，第2卷第5期（1920年11月15日）。

㊵東蓀：《答覆兼反問》，上海：《時事新報·學燈》，1920年12月8日；東蓀：《燒點須認清》，上海：《時事新報·學燈》，1920年12月9日。

㊶有關張東蓀對俄國勞農主義迎拒的轉變，可參見周月峰：《社會主義論戰前後張東蓀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合離》，成都：《社會科學研究》，2023年第3期。

㊷百里：《我的社會主義討論》，北京：《改造》，第3卷第6號。

㊸東蓀：《答高踐四先生書》，上海：《時事新報》，1920年11月13日。

㊹㊺同人：《宣言》，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第1號（1921年9月16日）。

㊻東蓀：《我們所能做的》，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第1號。

㊼陳嘉異：《關於社會主義之又一討論（四）——陳嘉異致東蓀》，上海：《時事新報》，1921年8月4日。

⑤⑦郭增愷：《通訊（致張東蓀）》，上海：《時事新報·學燈》，1921年12月7日。

⑤⑧費覺天：《對於社會主義爭論問題提出兩大關鍵》，北京：《改造》，第3卷第6號。

⑤⑨楊端六：《和羅素先生的談話》，上海：《東方雜誌》，第17卷第22號（1920年11月25日）。

⑥⑩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8頁。

⑥⑪程振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上海：《評論之評論》，第1卷第3號（1921年6月20日）。

⑥⑫力子：《再評東蓀君底“又一教訓”》，上海：《民國日報·覺悟》，1920年11月8日。

⑥⑬東蓀：《各方面的實做》，上海：《時事新報》，1920年11月15日。

⑥⑭東蓀：《心理學家之社會主義評判》，上海：《時事新報·學燈》，1921年8月1日。

⑥⑮⑯李達：《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上海：《新青年》，第9卷第1號。

⑥⑰李達曾回憶：“當時黨的工作只有兩種：第一是宣傳主義，第二是組織工人。”汪信硯主編：《李達全集》第十六卷，第2頁。

⑥⑱茅盾：《茅盾全集》第34卷，第200頁。

⑥⑲汪信硯主編：《李達全集》第十七卷，第365頁。

⑦①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卷，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第94頁。

⑦②唐寶林、林茂生編：《陳獨秀年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4頁。

⑦③⑦④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6頁；第14頁。

⑦⑤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編：《新民學會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23頁。

⑦⑥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第2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頁。

⑦⑦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檔案資料（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

104頁。

⑦⑧汪信硯主編：《李達全集》第十六卷，第2頁。

⑦⑨新凱：《共產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上海：《民國日報·覺悟》，1921年11月22日。新凱即許興凱。

⑦⑩東蓀：《對於一個批評的答覆二點》，上海：《時事新報》，1921年11月26日。

⑦⑪新凱：《今日中國社會究竟怎樣的改造》，上海：《民國日報·覺悟》，1921年12月25日。

⑦⑫東蓀：《通訊（答郭增愷）》，上海：《時事新報·學燈》，1921年12月7日。

⑦⑬《發刊詞》，北京：《先驅》創刊號（1922年1月15日）。

⑦⑭存統：《讀新凱先生底“共產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上海：《新青年》，第9卷第6號（1922年7月1日）。

⑦⑮旋：《評中國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北京：《先驅》，第3期（1922年2月15日）。

⑦⑯新凱：《再論共產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答張東蓀與徐六幾》，上海：《新青年》，第9卷第6號。

⑦⑰李季：《社會主義與中國》，上海：《新青年》，第8卷第6號（1921年4月1日）。

⑦⑱羅志田：《把“天下”帶回歷史敘述：換個視角看五四》，成都：《社會科學研究》，2019年第2期。

⑦⑲常乃惠：《中國思想小史》，上海：中華書局，1930年，第195頁。

⑦⑳力子：《主義與時代》，上海：《民國日報·覺悟》，1920年12月21日。

㉑李達：《馬克思派社會主義》，上海：《新青年》，第9卷第2號（1921年6月1日）。

㉒梁啟超著，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十四卷，第1頁。

㉓茅盾：《茅盾全集》第17卷，第622頁。

作者簡介：周月峰，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成都 610065

[責任編輯 陳志雄]